

网络扶贫的内涵及实践特色

李全喜

(北京邮电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6)



摘 要 借助文献研究和对比研究,在解释网络扶贫内涵的基础上,探讨了网络扶贫的实践特色。研究发现,网络扶贫能够推动扶贫思维的深层变革:从单向思维到互联网思维;助力扶贫对象的精准识别:从主观判断到科学界定;促进扶贫动力的内外融通:从外源救济到内生崛起;推进扶贫主体的系统升级:从单一分离到通力合作;优化扶贫路径的实践切入:从共性举措到个性特色;保障扶贫效果的稳定有序:从短期快速到长期持续。因此,在网络扶贫的过程中,既要注重提升网络扶贫主体的人力资本、加强农村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又要注重构建网络扶贫信息服务体系、培育贫困地区特色产业,推进网络公益扶贫有序发展。

关键词 精准扶贫;网络扶贫;三农问题;互联网+;电子商务

中图分类号:D 0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456(2019)03-0011-06

DOI 编码:10.13300/j.cnki.hnwkxb.2019.03.002

党的十八大以来,农村扶贫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截至 2017 年末,全国农村贫困人口从 2012 年末的 9 899 万人减少至 3 046 万人,累计减少 6 853 万人;贫困发生率从 2012 年末的 10.2% 下降至 3.1%,累计下降 7.1 个百分点”^[1]。然而,在扶贫过程中出现的“扶贫对象识别不精准,扶贫资源分配不合理;反贫问题严重,可持续性有待加强;扶贫工作主体单一”^[2]等问题依然存在,这些问题引起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2016 年 12 月 1 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网络扶贫专项行动把精准扶贫与互联网结合进行耦合思考,这为新时期精准扶贫拓展了新的思路。“首先在对象识别上,对贫困户、贫困村、贫困乡等扶贫对象识别上要精准;其次在精准识别基础上进行精准帮扶、精准管理;最后要对精准扶贫工作进行精准考核,确保各类扶贫资源优化配置,逐步构建扶贫工作长效机制”^[3]。实施有效的精准扶贫成为当前农村扶贫工作的指导思想。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的统计数据,2017 年我国网民数量达 7.7 亿人,农村网民占到 27%^[4]。这些数据表明在当前农村精准扶贫的过程中,不能忽视互联网技术的先导力量和驱动作用,应该充分发挥移动通信技术在扶贫过程中的功能。那么,网络扶贫的内涵是什么?网络扶贫在实施精准扶贫过程中具有哪些实践特色?如何有效地推进网络扶贫?这些问题值得思考。

一、网络扶贫的内涵

概念的界定是一切论述的前提。在探讨网络扶贫的过程中,首先需要弄清楚网络扶贫的内涵是什么?从目前学界的研究状况上看,学界关于网络扶贫内涵的研究主要是从网络技术的视角、精准扶贫的视角、农村电商的视角三个视角展开。首先,从网络技术的视角上看,学者倾向于从网络技术的社会功能出发阐释网络扶贫的内涵。有学者认为网络扶贫是指“运用大数据、物联网等信息通信手段,搭建以政府为主体、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扶贫信息综合平台,完善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协同机制,形成扶贫合力,开创贫困治理新模式”^[5]。也有学者则是从网络技术作为新的生产要素角度出发指出

收稿日期:2018-12-20

基金项目:北京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择优资助”项目“习近平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研究”。

作者简介:李全喜(1981-),男,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发展。

网络赋予精准扶贫实践的创新性,认为网络扶贫“利用互联网的大数据来促进精准扶贫识别、帮扶和管理等工作”^[6]。其次,从精准扶贫角度上,学界在界定网络扶贫的内涵时更加倾向于网络扶贫的精准性。有学者解析了网络扶贫与精准扶贫的关系,指出了网络扶贫的工具理性,认为网络扶贫是实现精准扶贫的有效手段。“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为脱贫攻坚工作提供了新思路、新举措,网络扶贫是互联网创新成果与精准扶贫方略的有效结合”^[7]。在此基础上学者进一步指出网络扶贫的内涵实际是指“用互联网武装头脑、用互联网发展经济、用互联网补齐短板、用互联网惠及民生、用互联网形成合力”^[7]。有学者则是立足精准扶贫的精准性出发,认为网络扶贫的内涵主要包括“依托互联网媒介技术对贫困人口精准识别、以互联网思维提升精准扶贫服务水平、利用互联网新兴技术助推贫困对象的自我发展能力”^[8]等方面。第三,从农村电商的视角上,学界更倾向于从网络扶贫对农村产业升级与业态培育的重大意义上界定网络扶贫的内涵。有学者指出“将信息时代日益主流化的电子商务纳入扶贫开发工作体系,创新扶贫开发方式和改进扶贫绩效的理念和实践”^[9]。还有一些学者从农村产业升级与新业态培育角度解析了互联网与农村电商的关系,进而指出网络扶贫是指“利用互联网形成的信息流、物流、资金流,突破资源与要素流动的时空限制,通过互联网的连接机制,将贫困地区的农产品生产、加工、流通、营销纳入以农村电商为纽带的供应链体系之中”^[10]的一种扶贫模式。综上所述,学界目前主要从三个视角对网络扶贫的内涵进行了界定,论及了网络扶贫、精准扶贫与农村电商的关系。尽管学界三个视角所界定的内涵并不统一,但这些界定和解释既看到了精准扶贫的目标性需要,又看到了网络扶贫的时代性需要,即这些界定充分看到了网络扶贫与精准扶贫“具有内在逻辑一致性”^[11]。在此基础上,立足当前学界对网络扶贫的界定和解释,本文所言的网络扶贫是一种在当前中国特色扶贫开发实践中,以实现贫困农民健康生存与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以助力精准扶贫为取向、以信息网络服务体系为支柱、以特色农村电商为支撑、以政府、市场、社会、农户协同攻关为基础的系统型扶贫模式。与以往的金融扶贫、交通扶贫、文化扶贫等模式相比,网络扶贫这一系统型扶贫模式在实施过程中具有鲜明的实践特色。

二、网络扶贫的实践特色

网络扶贫作为当代中国特色扶贫开发的实践创新,既具有以往扶贫工作的共性优势,又具有独特的实践特色。其实践特色主要表现在扶贫思维的深层变革、扶贫对象的精准识别、扶贫动力的内外融通、扶贫主体的系统升级、扶贫路径的实践切入、扶贫效果的稳定有序等方面。

1. 推动扶贫思维的深层变革:从单向思维到互联网思维

人的思维是实践的先导性因素,会贯穿人行为实践的始终,因此人的思维是否恰当会影响到行为实践的效果。贫困地区的精准扶贫同样离不开正确思维的指导。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扶贫开发实践的前五个阶段可以发现,党和政府一直比较重视农村扶贫工作,长期以来对农村反贫困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资本,着力推进农村贫困人口从解决温饱向实现小康的转变。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扶贫历史进程中,党和政府自上而下的行政性因素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伴随着这一进程的历史演进,一些人对以往扶贫实践存在认识上的误区,例如“扶贫的责任和义务完全由党和政府担当”“扶贫工作就是物质经济层面的救济”“扶贫就是缺啥补啥”……。从哲学上看,这些认识上的误区反映到实践中,其实是反映出以往扶贫实践单向思维的特征。以单向思维为指导,忽视了农村反贫困过程中政府和农民、农民和农民之间的整体性联系,农民反贫困的动力匮乏,容易产生对党和政府的单向依赖;政府扶贫的具体举措往往局限于资金等某个方面,无法实现扶贫的系统性效果。进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社会主义本质的层面诠释了扶贫的重要性,认为“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12]。随着信息通讯技术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将信息化与农村反贫困耦合起来进行思考,提出实施网络扶贫战略。毫无疑问,网络扶贫秉承的是互联网思维。而互联网思维突出“思维主体的个性化与社会化、思维客体的多样化和一体化、思维中介的虚拟化和网络化、思维方法的综合化和复杂化”^[13]。以互联网思维为指导,农村精准扶贫更能呈现出“多

元互联性、创新性、超越性、开放性、共享性、系统性、未来性”^[13]等基本特征。在互联网思维指导下,农村扶贫将大大增强政府与农民、农民与农民之间整体性联系,最大限度地激发农村扶贫中每个层面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同时也将农村扶贫各个子系统之间的非线性相互作用充分调动起来,突出农村扶贫的整体性效应。

2. 助力扶贫对象的精准识别:从主观判断到科学界定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开篇就讲:“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14]。毛泽东同志的这段论述是要告诉我们明确实践的客体与对象问题。那么同理,在精准扶贫实践中,我们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精准识别扶贫对象,这是整个精准扶贫的逻辑起点。如果这个问题做不好,在此背景下的扶贫实际上就有可能是在“扶假贫”或“假扶贫”,直接影响到扶贫资源的公正配置,进而引发民众对政府扶贫公信力的质疑。从词源学上看,“扶贫”顾名思义是对帮扶贫困户减轻负担、保障贫困户合法权益的实践。因此,这个概念本身就赋予了其对象选择的针对性。但从目前扶贫过程中对扶贫对象的选取问题上看,扶贫过程中明显还存在一些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一方面,“现阶段,识别贫困的主要依据是收入水平,而非考量贫困人口的生活质量”^[2]。另一方面,受中国传统社会影响,人们的社会关系网络实际上是一个差序格局。由此,在具体确定扶贫对象的过程中,一些基层工作人员容易受到传统的人情网络影响而主观判定。“大都采用村委会工作人员走访调查的方式,主观成分较大,识别精度受到了一定影响”^[6]。那么,如何规避这些问题、如何保证扶贫对象的精准性就成为当前农村扶贫工作中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随着信息通讯技术尤其是云计算、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精准圈定扶贫对象今后将不再是难题。借助互联网信息技术,搭建全国统一的扶贫开发大数据平台,通过设立科学的贫困认定指标体系,“从家庭房屋情况、粮食储备情况、劳动力工作情况、子女培养能力(学历程度)等指标对贫困户做出综合评测”^[6]。因此可以说,网络扶贫在扶贫对象的选择和确定上比以往扶贫中单凭基层工作人员的主观认定更为精准、更为公正。

3. 促进扶贫动力的内外融通:从外源救济到内生崛起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外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条件,内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本,外因必须通过内因才能发挥作用。对农村精准扶贫实践来说,既需要来自外因条件的支撑,更需要来自内因动力因素的激活。回顾以往的农村扶贫实践,可以发现,党和政府为农村扶贫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文件,奠定了必要的政策资本、制度资本的基础,提供了坚实的物质经济条件,推动农村扶贫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如果对这些扶贫方式进行哲学反思,可以发现以往农村扶贫实践更多地彰显出了“外源救济”的总体特征。在这样扶贫实践中,往往容易出现“政府高度重视与贫困农民消极对待”的热冷关系,例如“干部干、群众看”“干部着急,群众不急”“一些贫苦群众等靠要思想严重”“靠着墙根晒太阳,等着别人送小康”^[12]。对这样外因条件突出、内因动力不足的扶贫实践效果,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明确指出“没有内在动力,仅靠外部帮扶,帮扶再多,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12]。那么,为什么在以往扶贫过程中容易出现贫困群众动力不足的问题呢?笔者认为一方面受自然环境、社会历史等因素的影响,一些贫困群众的脱贫意识尚未形成、一些贫困群众因为自身发展能力受限,贫苦群众的脱贫致富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新性没有完全激发出来。另一方面,以往扶贫实践中自上而下的外源救济与贫困农民自我的真实需求之间可能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由此导致来自上层的扶贫动力与来自基层的脱贫动力无法形成强大的合力。而网络扶贫对改变这一局面提供了新的思路。在网络扶贫实践中,政府部门将改变过去直接送钱、送物的外源救济思路,将充分发挥互联网在农村扶贫中的重要作用,大力加强农村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着力培养农村贫困人口发展能力,借助四通八达的信息高速公路实现与贫困人口真实意愿的无缝对接。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网络扶贫的实践中,随着贫困群众发展能力的提升,贫困群众的自我脱贫致富的意识将不断得到增强。在互联网世界,每个贫困群众都是信息的发出者,将逐步从“要我脱贫”走向“我要脱贫”。贫困农民可以通过信息化的通讯手段,切实消除新时代的信息鸿沟,及时准确获取市场需求信息,然后提供自己的供给商品。从而在网络扶贫的过程中,实现农村扶贫动力的内外融通。

4. 推进扶贫主体的系统升级:从单一分离到通力合作

有了精准扶贫理念,能够准确识别扶贫对象,有效激发贫困群众的脱贫动力,满足了这些条件还不能有效地推进网络扶贫。因为这里面还存在“谁来扶”的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涉及的是扶贫的主体问题。传统的农村扶贫更多地彰显简单的主客二分关系。也就是说,按照以往农村扶贫的实践,往往倾向于把政府作为扶贫的单一主体,把贫困农民作为扶贫的客体对象。因此这样自上而下的外源救济型的扶贫实践往往彰显单向性的客体主体化的过程。这样的扶贫实践往往“很难准确把握不同地区的贫困现状,难以真正实现精准扶贫。而且,政府一方承担扶贫工作难免产生巨大的财政压力”^[2]。这种把扶贫看成“政府”与“贫困农民”主客二分的做法显然已经无法适应当前扶贫工作发展的需要。从系统科学上看,农村扶贫是一个开放性的系统工程,离不开政府、企业、社会、贫困群众等各方面的通力合作。在网络扶贫实践中,政府部门、企业部门、社会组织和贫困群众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非线性相互作用,因此只有明确政府部门、企业部门、社会组织和贫困群众在网络扶贫中的清晰定位,进而充分发挥每个子系统的功能作用,才能形成强大扶贫合力,真正把农村扶贫工作推向前进。在网络扶贫实践中,政府部门着眼于做好顶层设计,建立健全扶贫工作机制;扎实推进农村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统筹协调扶贫资源配置。企业部门切实履行社会公益责任,减少贫困农民信息获取成本,降低贫困农民信息融入的门槛。在企业发展战略上针对不发达地区、农村地区予以倾斜和照顾^[15],针对贫困农民开发具有差异性的信息扶贫程序或技术,为减少贫困农民与市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或信息失真做出实质性努力。合法的社会组织部门在网络扶贫中更多的应该关注政府部门顾及不到或无法很好完成而市场部门不愿介入的工作方面,切实为贫困农民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贫困农民是网络扶贫的主力军。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主力军。因此,网络扶贫更应该充分激发贫困群众的主动性与创造性,因为“脱贫致富终究是要靠贫困群众用自己的辛勤劳动来实现的”^[12]。因此,网络扶贫将改变以往扶贫实践简单的主客二分的关系,将扶贫主体从单一分离的政府部门拓展到政府部门、企业部门、社会组织和贫困群众等各方面。网络扶贫更加注重这四个方面的通力合作。

5. 优化扶贫路径的实践切入:从共性举措到个性特色

唯物辩证法认为任何事物的发展都遵循了对立统一规律。在事物发展多对矛盾体系中主要矛盾决定事物发展的方向,起着主导作用。因此要求我们在实践中要善于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推动事物的发展。从哲学上看,精准扶贫同样是包括了多个层面的矛盾体系。因此精准扶贫实践绝不是摊大饼式的一哄而上,更不是不分轻重缓急的平均主义,只有抓住精准扶贫实践中的主要矛盾才能有效推进扶贫工作的进程。然而,就扶贫的整个历史发展阶段而言,其主要矛盾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而发生变化。从新中国成立以来近 70 年的时间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在这样一种主要矛盾的语境中,在以往扶贫过程中更多偏重的是贫困地区贫困群众共性的普惠性的物质救济,关注更多的是贫困人口能否健康生存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扶贫对象尚未进行准确的程度区分,扶贫方式尚未进行差异性的精准定位。但随着新时代的到来,特别是党的十九大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进行了创新性地界定,认为我国现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给新时代的精准扶贫工作带来新的理念和新思路。一方面,贫困群众的脱贫目标不再仅仅局限在物质文化层面,同样赋予了贫困群众美好生活的追求目标,贫困群众脱贫目标的异质性问题日益显现出来。另一方面,随着扶贫进程逐步推进,如何加大力度推进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应该成为当前扶贫工作的重中之重,特别是“重点解决深度贫困地区公共服务、基础设施以及基本医疗有保障的问题”^[12]。同时,当前中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特别是信息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给当前农村精准扶贫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信息互联网技术目前成为影响当今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载体。如何利用信息通讯技术为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农村脱贫已经是必须思考的问题。在甘肃陇南,为了摆脱贫困,当地政府将电子商务作为发展战略之首,走出了一条贫困地区发展电子商务的“陇南模式”等;在江西瑞金等地,特色的“互联网+乡村旅游”项目正如火

如荼地开展^[16]。因此,与传统扶贫方式不同,网络扶贫借助信息互联网技术,通过发展电子商务工程和实施信息服务工程,更加注重贫困地区的个性特色发展需求,使得一村一品、一县一平台、一乡一节点、一村一带头人、一户一终端、一户一档案等个性化、特色性的信息服务体系真正落到实处,能够切实将扶贫路径的实践切入点从共性普惠转向个性特色。

6. 保障扶贫效果的稳定有序:从短期快速到长期持续

从历史唯物主义来看,扶贫的终极价值取向是为了助推贫困群众实现美好生活。从过去扶贫效果来看,直接的物质救济的确在短期内帮助贫困人口脱离贫困线。但这种外源输血式的扶贫并不能从根本上确保贫困群众能够永远远离贫困线。因此以往扶贫实践的突出特点是物质为主、期限较短、脱贫快速,但同时也存在一些“扶贫开发人员把贫困人口脱贫致富当作政绩目标,缺乏对贫困人口的长期可持续的关注”^[2]的问题,即贫困农民存在着脱贫后返贫的风险。此外,由于以往扶贫过程中缺乏对贫困人口、贫困程度、致贫原因的精准分析,往往采取的是直接的简单的物质帮扶。因此可以说以往扶贫工作更多聚焦在如何让贫困群众脱离物质贫困、保障贫困群众健康生存的层面。与以往扶贫方式不同,一方面网络扶贫不仅关切贫困群众的健康生存,更加关注贫困群众的持续发展。这说明网络扶贫更多彰显了代际的发展关切。它不但关心当代人的发展问题,同时也关注后代人的发展问题,意在切断贫困问题的代际传承。另一方面网络扶贫是人力扶贫、教育扶贫、交通扶贫、金融扶贫、信息扶贫、生态扶贫等方面的总和。这是基于网络作为融通上述各种扶贫的中介和工具,有助于上述各种扶贫方式的深度融合。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因此无论是之前的扶贫实践还是今后的网络扶贫,最关键的因素还是人。尤其对网络扶贫而言,如何打造网络扶贫所需的专业技术研发人员、如何培养一批精通农村业缘的电子商务人员、如何提升贫困群众的信息综合素养、如何稳定一批高素质的农村基层网络服务人员应该是今后网络扶贫中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网络扶智做到实处,真正实现“输血式扶贫向造血式扶贫转变,才能使贫困人群有能力自主发展电子商务,接受网络信息服务,构建起人人参与的网络扶贫大格局”^[17]。由此可见,随着网络扶贫的深度实施,人们对扶贫效果的关注也从短期快速转向长期持续。

三、结 语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网络扶贫作为信息化时代中国扶贫开发中的重大实践创新,它把互联网技术与治理贫困结合起来给精准扶贫与精准脱贫提供了强大的支撑作用。网络扶贫为新时代中国特色扶贫实践注入新的活力,网络扶贫思想深入回答了在信息通讯快速发展的今天“为什么扶贫”“为谁扶贫”“谁来扶贫”“如何扶贫”等重大问题。网络扶贫的实施有助于精准识别扶贫对象,有助于扶贫动力的内外融通,有助于扶贫主体的系统升级,有助于扶贫路径的实践切入,有助于扶贫效果的稳定有序。在实施网络扶贫的过程中,我们既需要正视网络扶贫面临的“进一步提高宽带网络的覆盖率,进一步降低贫困村使用成本,进一步扩大宽带网的应用范围”^[18]等难题,同时还需要应对扶贫脱贫实践面临的扶贫政策公平属性弱化、扶贫干部工作绩效考核数字化、地方政府、村干部与贫困户共谋和贫困户对政策的福利依赖”^[19]等问题。

因此,结合网络扶贫的内涵与实践特色,在网络扶贫的实践中要强化对以下几个方面的思考:首先,提升网络扶贫主体的人力资本。在网络扶贫过程中,政府部门应将贫困地区“扶智”工作与“扶志”工作放在突出位置,夯实贫困地区教育基础,提升贫困地区的教育水平。同时通过远程教育、精准培训等方式增强贫困农民的信息素养,用互联网思维指导农村反贫实践,切实阻断贫困农民的贫困代际传递链条。其次,加强农村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贫困地区特别是深度贫困地区往往因为自然环境条件增加了脱贫的难度。因此,“加大对中西部贫困地区移动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力度,加快推进贫困地区网络全覆盖”^[20]。复次,构建网络扶贫信息服务体系。借助当前的大数据、云计算等网络技术手段,切实构建全国统一的网络扶贫信息服务平台。进而依托网络扶贫信息服务平台,政府部门、企业、社会与贫困农户能够进行数据信息共享,确保扶贫“扶真贫”与“真脱贫”。再次,培育贫困地区特色产业。立足贫困地区的实际情况,努力把“一村一品”工程落到实处,切实树立农村电商品牌意

识。在此基础上,不断完善贫困地区农村物流基础设施建设,拓展农村电商的业务范围,吸纳更多农村劳动力进行非农就业。最后,推进网络公益扶贫有序发展。借助互联网特别是新媒体技术,积极开展网络公益扶贫活动,营造网络公益扶贫的社会价值氛围,建立健全社会公益组织参与网络公益扶贫激励机制,最终促使全社会汇聚网络扶贫的强大合力。

最后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深入推进网络扶贫的过程中,“如何整合各种扶贫力量,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精准扶贫中的作用,进而实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目标仍存在许多困惑”^[21]。同时如何认识网络扶贫与精准扶贫的相互作用机理?网络扶贫系统的内在逻辑与层级关系是什么?网络扶贫的评价指标体系包括哪些内容?网络扶贫中如何理顺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如何认识网络扶贫中网络对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等方面的作用?这些问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参 考 文 献

[1] 陈炜伟.2017 年末农村贫困人口减至 3046 万人[N].人民日报(海外版),2018-2-2(2).

[2] 王曙光,王琼慧.论社会网络扶贫:内涵、理论基础与实践模式[J].农村经济,2018(1):1-10.

[3] 左停,杨雨鑫,钟玲.精准扶贫:技术靶向、理论解析和现实挑战[J].贵州社会科学,2015(8):156-162.

[4] 郭永宏.推广网络扶贫,关注信息化与三农对接[N].检察日报,2018-6-11(7).

[5] 同春芬,张浩.“互联网+”精准扶贫:贫困治理的新模式[J].世界农业,2016(8):50-56

[6] 孙久文.网络扶贫为农民拔穷根[J].人民论坛,2017(1):56-58.

[7] 王沛栋.网络扶贫:实现精准扶贫的有效手段[N].河南日报,2016-12-2(9).

[8] 赵秀兰.“互联网+”精准扶贫模式:主要内容与政策建议[J].农村经济,2017(8):57-61.

[9] 汪向东,王昕天.电子商务与信息扶贫:互联网时代扶贫工作的新特点[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4):98-104.

[10] 朱海波,熊雪,孔祥臣.“互联网+电商”促进贫困地区农村经济发展的路径探索、成效与思考[J].农村金融研究,2017(8):13-18.

[11] 郑志来.“互联网+”视角下民族地区特色产业精准扶贫发展路径创新[J].当代经济管理,2018(7):35-39.

[12]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13] 常晋芳.网络哲学引论[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

[14]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

[15] 杜晓.强化网络扶贫的法制保障[N].法制日报,2016-7-29(7).

[16] 祝君红.包容性创新视角下的多元化网络扶贫研究[J].金融经济,2017(12):15-17.

[17] 潘玥斐.网络扶贫毋忘扶智[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11-9(1).

[18] 孙喜保.工信部:网络扶贫面临三大挑战[N].工人日报,2018-6-7(4).

[19] 方菲,张恩健.工具理性:精准扶贫实践困境的一个伦理学解释——基于我国中部地区 Z 村的调查[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116-122.

[20] 孙琳.做网络扶贫的主力军[N].人民政协报,2017-10-10(7).

[21] 殷强,丁建军,李峰.大数据时代精准扶贫公共服务平台构建研究——基于公共服务供给分析框架的视角[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138-144.

(责任编辑:金会平)